

从中华书局海外馆藏看 中国学术图书的世界影响力

●何明星

摘要：本文基于世界170多个国家约2万多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分析了中华书局版图书在全球馆藏数量最多的100种图书的内容、出版时间以及馆藏国家分布，尝试着勾画出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地图，从而探讨图书的传播范围与出版组织机构价值追求之间的逻辑关系。

关键词：海外馆藏 中华书局 世界影响

笔者曾经是一个出版中人，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自己编辑的图书有谁在看、谁在读？同样，中国出版的图书，哪些国家、哪些民族、哪些读者更感兴趣？这涉及到一个出版机构的价值追求以及核心目标，也涉及到学界对于出版组织机构评价的理论问题。

当下学界大都流行经济学的一套评价办法，如从出版图书的总品种、新书品种、重印再版、印数、畅销书数量、销售收入、利润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各种评价模型大约有十几种^[1]，有的甚至建构出一套评价模型，利用一些公开数据对中国近600家出版社给予大排队。显然，这些评价办法大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出版社也是一个媒体，它的核心任务是传播。比如，对于一本图书的流传范围如何评价？目前国内几十种模型中都没有突出这一项。其实，人类的文明就是书籍的文明，当一本书能够翻过高山，越过河流，坐着火车、汽车甚至马车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就是这本书出版者最大的光荣！传播才是图书出版的本质，不管图书的出版者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还是一个家庭作坊，只要所出版的图书能够广泛传播，就都实现了出版的目的。传播范围才是最为公正的检验标尺。

那么，有没有一个依据传播范围给出版机构排名的办法呢？笔者发现，把全球170多个国家的2

万家图书馆连接起来的WORDCAT书目数据库^[2]，恰好能够满足这一部分要求。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年之际，笔者尝试利用这个数据库检索了中华书局版的图书在世界馆藏国家分布以及内容分类情况，虽然还有许多因素不清楚，但初步勾画出了中华书局这个百年出版机构的世界影响地图。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书局版图书的影响范围，就是附载图书之中的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的影响力所使然。这种评价方法，或许能够弥补当下单一以产业化方法评价出版机构的片面性。

一、中华书局的哪些图书传播范围最广

本文的检索日期是2012年5月10日至6月10日，每天检索一次，跟踪以馆藏数量排名的前100种中华书局版图书，排名结果是稳定的，基本没有变化。按照馆藏数量最多排名，从第一名到第30名，正好是100种图书。这100种图书，回答了中华书局一百年来哪些图书传播范围最广的问题。最多的一种书是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的6册85卷《隋书》，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116家，扣除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实际为115家；其次是1975年出版的《南史》80卷，图书馆数量达到106家，扣除中国图书馆数，实际达到104家。与其并列的还有《辽史》116卷、《新五代史》3册74卷。排名第

30 位的图书有 3 种, 其中有 1982 年出版的《元稹集》、1987 年出版的新校本《庚巳编》、1995 年出版的郭英德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00 种图书内容基本属于中国历史类, 这和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十分吻合。其中中国历史典籍的排名都很靠前, 比如《隋书》、《辽史》、《南史》、《新五代史》、《梁书》、《北齐书》、《旧五代史》、《北史》、《新唐书》、《明史》等在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排名中分列第 1 至第 8 名, 表明历史典籍图书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是中华书局的“金字招牌”。这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国家组织大批专家校点二十四史, 并把中华书局作为典籍整理出版基地的政策。因为历史典籍的校勘而带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历史类图书出版, 形成了集群效应, 由此打造了今天中华书局历史类学术图书的品牌。

如果仔细分析这 100 种图书的出版时间, 我们还发现, 这些图书出版的时间最多的是 1972 至 1990 年这 19 年, 基本保持在年度出版 2 种以上, 总品种数量达到 77 种。最多的 1979 年 11 种、1980 年 6 种, 1981 年 5 种; 而此前的 1973 年是 3 种、1974 年是 6 种、1975 年是 5 种、1976 年是 3 种、1977 年是 6 种; 此后 1987 年是 3 种、1988 年 4 种、1989 年 5 种、1990 年是 2 种。在 1959 年至 1965 年的 6 年间, 也保持了年度 1 种以上, 总品种数量达到 12 种; 1959 年 2 种、1963 年 3 种、1964 年 4 种、1965 年 2 种。具体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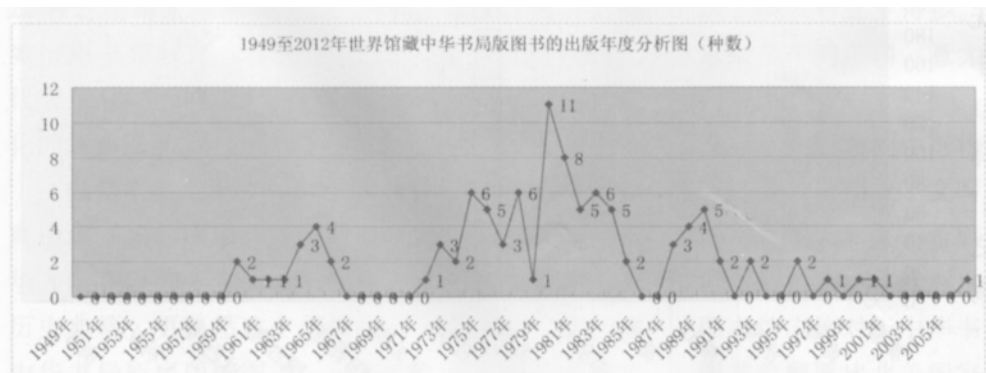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馆藏 100 种中华书局图书的出版时间

从 1990 年以来, 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排名的中华书局的图书呈逐年下降趋势, 尤其是中华书局 2000 年以后出版的图书, 只有两种进入前 100 名, 分别是《王伊同学术论文集》, 2006 年出版, 世界收藏图书馆数量为 62 家。其次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2000 年出版, 世界收藏图书馆数量为 57 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这是值得业界、学界思考、探索的一个问题。

以进入世界馆藏排名的 100 种中华书局版图书为例, 位列前 8 名的图书均为中国历史典籍, 而中国历史典籍的整理之所以具有如此之高的学术质量, 背后依靠的是当时国家组织、动员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的参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齐燕铭, 在 1957 年 12 月 10 日上报了一份给政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名单, 其中文学组召集人是郑振铎, 成员有王任叔、叶圣陶、隋树森、赵万里、钱钟书等。历史组召集人是翦伯赞, 成员有于省吾、尹达、白寿彝、邓拓、顾颉刚等。哲学组召集人是潘梓年、冯友兰, 成员有王维庭、石峻、朱谦之、李达、李俨等。^[3]其涵盖了当时全国文学、史学、哲学领域造诣最高的一批顶尖学者, 这些人绝大部分参与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经过这些学者选本、校勘的一大批中国传统典籍图书, 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出版, 其间虽然因为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而时常受到影响, 但大部分历史典籍还是在 1960 年至 1965 年间得到了出版面世。

比如, 进入世界馆藏前 100 名的图书中, 1959 至 1965 年的 12 种就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而 1972 至 1990 年出版的 77 种图书, 著者、编校者大部分都是这一个历史时期的学者, 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古籍整理的工作。如中华书局 1983 年

出版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世界收藏图书馆数为79家，排名第9位。编选者逯钦立（1910—1973），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中国古文献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1951年至1973年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与其并列第9位的《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编注者是清代学者王琦，该书是众多李白诗辑注的精品。位列第10位的《庄子集释》，编辑者也是清代的学者郭庆藩，经当代学者王孝鱼先生点校后由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成为庄子注释本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类似的还有1979年出版的《柳宗元集》和1979年出版的《杜诗详注》，《杜诗详注》辑注者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仇兆鳌。1990年出版的《论语集释》世界馆藏图书馆数量为65家，排名第19位，撰者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程书德，他的后人程俊英、蒋见元二位先生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教授，该书在1987年重新校点后出版。除个别图书之外，在1972年至1990年出版的77种图书，可以说绝大部分得益于国家组织的古籍整理计划。

可见，对于知识生产而言，只有以公益性为宗旨的长期人力、物力持续投入才能实现目标，如果没有二十四史整理出版计划，就不会有中华书局这样一大批高质量的历史图书出版；没有国学积淀深厚的一代学人持续几十年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新编诸子集成”等系列产品。自1990年之后，随着这一代学人纷纷离世，一些所谓的“精品力作”乏善可陈，自然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图书也逐渐减少。

二、世界哪些国家、地区收藏中华书局的图书

本文按照馆藏量排名，分别统计了馆藏中华书局这100种图书的世界各国及地区图书馆数量，按照所属国家及地区，绘制了馆藏中华书局图书的国家地区分布图，见图2：

由图2可以发现，馆藏中华书局图书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83家图书馆，其次是澳大利亚，有21家图书馆，再次是加拿大，有15家图书馆。

依据馆藏中华书局图书的数量，分析这些图书馆的国家、地区分布，值得研究的有三点：首先，为什么美国是中华书局图书的最大购买者，竟然达到173家图书馆，是第二名澳大利亚的8倍多？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清美国这些图书馆的性质。馆藏数量最多的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馆藏种数达到97种，其次是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UNIV, YENCHING LIBR）95种，第三名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 LIBR）有92种。馆藏90种以上的还有美国图书馆、芝加哥大学（UNIV OF CHICAGO）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 AT PRINCETON UNIV），均为90种；馆藏80种以上的有13家，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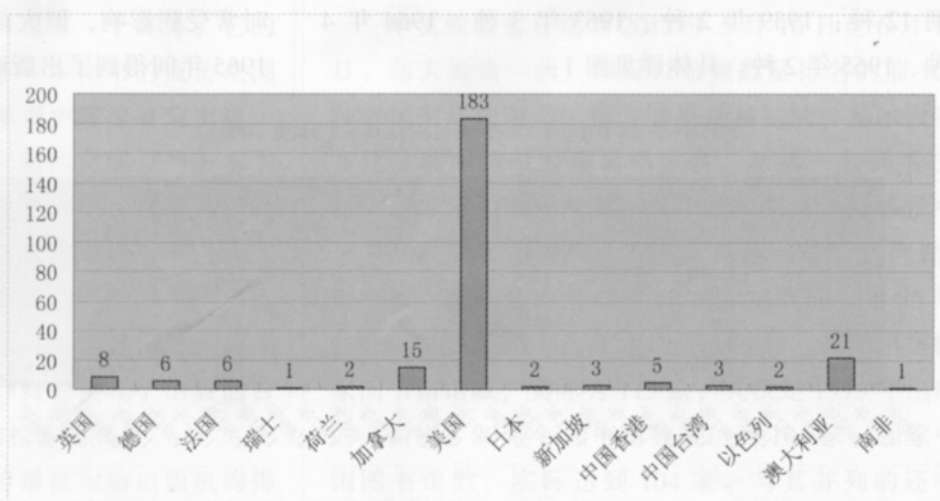


图2 1949年至2012年世界收藏中华书局图书的图书馆国家、地区分布

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心图书馆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GEN LIBR SYS) 均为 89 种; 馆藏 70 种以上的有 9 家, 其中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 79 种,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 OF PENNSYLVANIA) 是 75 种; 馆藏 60 种以上的有 5 家, 其中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波尔德分校 (UNIV OF COLORADO AT BOULDER) 和莱斯大学范登图书馆 (RICE UNIV, FONDREN LIBR) 最多, 均为 68 种; 馆藏 50 种以上的有 6 家, 其中艾奥瓦大学 (UNIV OF IOWA LIBR) 57 种; 馆藏 40 种以上的有 12 家,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图书馆 (STATE UNIV OF NEW YORK, BINGHAMTON LIBR) 49 种, 格林内尔学院 (GRINNELL COL) 48 种; 30 种以上的 14 家,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 为 39 种,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SUNY AT BUFFALO) 和西华盛顿大学 (WESTERN WASHINGTON UNIV) 均为 38 种。显然, 美国这 173 家图书馆中, 绝大部分是学术型图书馆。美国最优秀大学几乎都涵盖其间,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从常春藤大学到各个州立大学, 大量购买中华书局的历史典籍和大量高质量的学术图书主要用于学术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进入排名的还有一些城市图书馆和博物馆, 数量要远远少于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 53 种, 纽约州立图书馆有 47 种, 纽约州立图书馆罗斯分馆有 24 种, 史密森博物馆有 22 种, 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有 221 种, 这些城市图书馆较之大学图书馆更具有广泛的传播性, 代表了除学术圈子之外, 美国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

根据笔者的初步探讨, 美国所以能够大规模馆藏中华书局的图书,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华人学者服务于美国图书馆界, 他们熟悉中国传统历史典籍, 更熟悉这个领域的研究学者, 自然关注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图书。比如老一代华裔学者中有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 1933 年生于广州并担

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的李伟华先生; 新一代学者中有美国俄亥俄威斯利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金旭东先生, 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的李国庆教授, 密歇根大学东亚部主任杨继东教授,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沈津教授等等。这么多华裔学者服务于美国图书馆界, 使中国历史类图书大为受益, 同时也表明美国这个国家的开放胸襟。一个文明的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向其他文明学习、吸收知识的能力。美国能够在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此。美国馆藏中华书局图书的种数、图书馆数量在全世界的绝对领先地位, 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一点。

第二, 与美国的数据相反, 欧洲的几十个国家中, 只有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 5 个国家进入排名, 图书馆数量为 23 家。按照馆藏数量的排名, 第 1 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 (UNIV OF LONDON, SCH OF ORIENTAL & AFRICA) 有 47 种, 第 2 名是英国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 有 41 种; 第 3 名是英国爱丁堡大学 (EDINBURGH UNIV LIBR) 有 39 种; 第 4 名是荷兰莱顿大学 (UNIVERSITEIT LEIDEN) 有 28 种; 第 5 名是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图书馆 (BIU LANGUES ORIENTALES) 有 11 种。

欧洲 5 个国家 23 家图书馆的数据特别值得深思。以对中国的了解熟悉的历史来看, 欧洲要比美国、澳大利亚早得多。比如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最早来到中国, 意大利人利玛窦在 400 年前就来到中国。从那时开始, 几百年间欧洲的大批传教士、商人不间断地到中国传教、旅行和长期居住, 最早一批传教士用拉丁文写就介绍中国的文字, 此后用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英文等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信札不断在欧洲出版传播。按照常理, 欧洲的图书馆应该对于中华书局的历史典籍、传统文化的图书收藏要比北美国家多才对, 但为什么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 笔者尚未找到答案。

第三,由馆藏中华书局图书的国家地区分布图来看,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没有进入排名。比如非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南非入选,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家无一入选。亚洲中只有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而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更是难见踪影。这个数据是不是再次验证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只有国家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才有资财构筑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结论恐怕是肯定的。

但中华书局图书在发展中国家的馆藏数据,似乎也表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让这些发展中国家挪出购买粮食、建筑公路的钱来购买中国图书?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刘欣路博士曾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作为授课教师参与了商务部组织的5期阿拉伯官员培训班的教学工作,他对108名学员进行了调查,在回答“关于中国你最想了解什么”时,选择最多的是“改革开放经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则没有人选择。刘欣路博士还在2011年10月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对该校150名阿拉伯学生就同样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与之前一致。刘欣路博士认为,阿拉伯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而非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这个结论似乎回答了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不收藏中华书局图书的原因,当然这个问题

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要透彻解答还需要深入探讨与专题研究。

总之,这样一份中华书局图书的世界馆藏数据的形成,还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除了WORDCAT书目数据还不足以覆盖更多的图书馆,造成一些数据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中文的普及程度,因为进入排名的100种图书,都是中文图书,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的一些结论大多是推论性质,还显得很不够严谨。依据这份数据所勾画出的中国文化影响力版图,似乎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本文依托全球馆藏数据,摆脱当下学界、业界用产业化的方法来评价中华书局这样一个百年老店,是一个学术探索的开始。让笔者振奋的是,通过这份数据,我们得知了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的《隋书》,在40年前已经摆到了全世界115家图书馆的书架上;截至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100种图书,收藏图书馆已达258家。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起步,这对于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与未来战略规划,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基点。

参考文献

- [1] 徐小杰.图书出版产业评价体系 [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6-42.
- [2] 李侃.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A].回忆中华书局(下篇) [C].北京:中华书局,1987:2.

(本文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研究》入选2012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讯 201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2012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根据2010—2011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综合评价数据和评审专家组评议,《出版发行研究》入选为2012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出版发行研究》作为出版专业核心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复印报刊资料”此次共遴选出772种重要转载来源期

刊,《出版发行研究》名列其中。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该刊的学术权威性,证明了该刊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与广泛的学术传播力,同时也说明该刊是名副其实的“学术高地、创意摇篮”。这其中有《出版发行研究》人几十年奋斗的心血与汗水,但最重要的是靠作者与广大读者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谨向全体为《出版发行研究》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所有人员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兰舟)